

古代钱币与《千字文》

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。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……”诞生于1500年前的《千字文》可能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古代经典著作之一，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并称为古代三大蒙学读物，千百年来，广泛流传，家喻户晓。古人不仅以《千字文》作为学习文字、练习书法的范本，还用以记数与标明顺序，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。在古代钱币上也可以寻到《千字文》踪影。

《千字文》全文为四字句，内容丰赡，涵盖了天文、地理、自然、社会、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，音韵谐美，对仗工整，条理清晰，文采斐然。语句平白如话，易诵易记，非常适宜蒙童记诵、学习，成为千百年来影响很大的传统蒙学经典教科书，并被译为英文、法文、拉丁文、意大利文等版本，在全球广泛传播。

由于《千字文》的广泛影响，宋代开始，在整理档案时即采用《千字文》中的文字顺序为档案编号、分类、编排，形成档案管理的千字文编号法。元、明、清时期不少官府档案仍用千字文编号管理。用《千字文》记数标序的做法一直延续到了近代。古代发行的纸币，也使用千字文作为纸币票券发行冠字，用

来记录每张纸币的发行批次和排列顺序，以此统计和控制纸币印刷数量，也可以发挥防伪作用。

“冠字”也称“字头”，即印在票券号码前面的文字或符号，用以表示各种票券的批次。目前所知，我国古代最早使用冠字号码的纸币是南宋纸币。从存世的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上可以见到，南宋行在会子钞票上已经使用大写的中文数字作为钞票编号。根据史籍记载，金代纸币已使用《千字文》中的文字作为钞票冠字，可惜尚未见实物。此后，蒙元、明清纸币使用《千字文》作为冠字的已较为多见。

清代咸丰年间，因内外交困、国库亏空，官府发行两种纸币以解困：一种是“户部官票”，一种是“大清宝钞”，合起来就叫“钞票”，钞票名称由此而来。“户部官票”和“大清宝钞”票面上都以《千字文》作为冠字。咸丰四年（1854）二月发行的“户部官票”纸币，票面框内右侧竖列文字“盈字第三千三百六十八号”，即使用《千字文》第11个字“盈”字作为钞票冠字。清代咸丰年间发行的另一种纸币——“大清宝钞”，票面也使用千字文句子“劳谦谨敕”中的“谨”字作为钞票冠字。



全属铸币上的“千字文”

不仅中央政府纸币，清代地方政府发行的钞票也采用《千字文》作为冠字。甲午战败后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。台湾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入侵、誓死捍卫祖国领土完整，为筹措抗日军费，发行台南官银票、台南官钱票。台南官银票、台南官钱票以《千字文》的“天、地、玄、黄、字、宙、洪、荒”等文字作为编号序列，每一序列，自一号至一千号。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湖北银元局发行面值壹大元的银元票，票左侧银元图案下方竖列钞票冠字号码“慈字第五壹号”，“慈”字来自《千字文》里的句子“仁慈隐恻”。

使用《千字文》作为冠字编码的纸币，既有官府发行的钞票，又有民间发行的

纸币。如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福建省万亨钱庄发行的“伏番壹员”钞票，票面左侧为出票日期及钞票编号“父字陆零壹”字样。冠字“父”字来自《千字文》：“资父事君，曰严与敬。”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天津万义川银号发行的天津通行银元1元票，正面右侧竖列冠字号码“川字第×××号”，以《千字文》句子“川流不息”中的“川”字为冠字。直到民国时期发行的民间钱票上还有以《千字文》作为冠字编号的。如民国时期山东省蒙阴县发行的“蒙阴县二十九年临时救济抵粮券”，票背面中间盖有一方大印，右边有手写钞票冠字号码和骑缝章。手写字是以千字文为钞票冠字，如“玄”“黄”等。

除了钞票上使用千字文作为冠字编码，古代金属铸币上也有使用千字文

的，如清代“光绪通宝”钱背有千字文“字、宙、日、列、来、往”等，这些千字文的作用不是为了编号排序，竟然是为了监督铸钱的目的而铸，这与当时防止钱局不铸新钱、私下买卖流通制钱凑数的作弊行为有关系。清光绪年间，民间私收、私毁、私铸制钱成风，官府铸钱局也参与买卖制钱以充数，不开炉铸新钱，导致官铸制钱日渐稀少，造成交易不畅，钱荒日益加重。当时朝野纷纷奏议，要求严查钱局私贩制钱，革除积弊，以正国法。据《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》记载：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十八日，御史安维峻请严查钱局私收制钱及私铸、私运奏折称：“户部宝泉局炉头为省工费，将上次发出之制钱，仍收买入局，至下次复行发出，如此周转，并不多铸新钱，又将所领铜料暗中私售，即从所获赢利，为下次收买之资。以故钱之来源既少而又不得流通。应请旨飭下户部堂官，彻底清查以重圆法，除积弊。”为解决官局炉头不开炉铸制钱，将节省下来的工费私私等问题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，户部尚书麟书提出解决方案：“……今思得一除弊之法，拟嗣后户工两局鼓铸制钱，仿照我朝

顺治、康熙年间旧制而变通之，于钱之背面空处，将钱模加一楷字，按照《千字文》字样一季一换，该局印钱即按季尽数批解，庶验收时不难立辨。如蒙俞允，再由臣部详核，应自何时更换，行知该局遵照办理”。朝廷很快批准了麟书的建议。以前一般认为，宝泉局宝源局“光绪通宝”背千字文钱仅仅铸造了“字、宙、日、列、来、往”六字就停止了。但近年又发现了宝源局“光绪通宝”背千字文“天”“地”钱。除了中央户部宝泉局、工部宝源局铸有千字文钱外，光绪时期一些地方铸钱局也铸有千字文钱，如临近北京的天津宝津局铸有“字、宙、日、列、往、来、元、琨”等几种千字文钱，但每一种千字文钱都非常少见，其中背“琨”字最为稀见，仅存世数枚。云南宝云局、宝东局铸有背“金”“村”字千字文钱，也不多见。

不仅我国古代钱币上有千字文，我国周边国家古代发行的钱币上也出现了千字文，如朝鲜李朝铸行的“常平通宝”钱，就选用了《千字文》中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，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”等44个文字作为钱币背文，蔚为大观，显示了中华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强大影响力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唐朝的凤池



能仁寺内《凤池》诗意图

大明宫“和诗”说凤池

唐朝诗人间时兴“和诗”，即一人先咏，然后，一人或两三人应和而诗。现在也叫同题诗。

在唐长安“千官之宫”的大明宫，围绕着“凤池”，曾经发生了贾至与王维、杜甫、岑参四位诗人，相与

唱和的逸事。唐肃宗乾元元年的春天，当时，贾至、杜甫、王维、岑参为同僚。作为中书舍人的贾至最先写了《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》一诗：“剑佩声随玉墀步，衣冠身惹御炉香。共沐恩波凤池上，朝朝染翰侍君王。”接着，杜甫、王维、岑参三位和《早朝大明宫》。其中杜甫的《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》有“池上于今有凤毛”之句；王维《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》中曰“佩声归到凤池头”；岑参《奉和中书舍人贾至早朝大明宫》中有“独有凤凰池上客”之句。四人同题，即早朝大明宫，都是围绕着“凤池”来创作的，即意象同为

凤池、凤凰池。中书省地近官禁，因以凤池（凤凰池）借指中书省。唐·杜佑《通典》卷二十一《职官三》中载：“魏晋以来，中书监令掌赞诏命，记会时事，典作文书，以其地在枢近，多承宠任，是以人因其位，谓之‘凤凰池’焉。”贾至时为中书舍人，四人诗中的凤池，就是指中书省。

唐代诗人咏“凤池”

对于凤池，唐代诗人趋之若鹜，他们不厌其烦地去写。因而唐代写凤池的诗句太多啦，数不胜数，蔚然大观。“凤池”几乎成为唐明皇时代第一大主题，也是诗人采用最多的意象之一。如贾至《送南给事贬崖州》中的“畴昔丹

墀与凤池”句；杜甫《得房公池鹅》的“凤凰池上应回首”句、《紫宸殿退朝口号》的“会送夔龙集凤池”句，以及《秋兴八首·其八》的“碧梧栖老凤凰枝”句；岑参《刘相公中书江山画障》的“忽疑凤凰池”句及《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》的“清切凤池”句。诗写凤池，诗仙李白也绝不会缺席，除了《赠江夏韦太守良宰》写道“君登凤池去，忽弃贾生才”，其他的还有《张相公出镇荆州，寻除太子詹事，余时流夜郎》的“凤凰忆故池”、《窜夜郎，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瓌》的“三人凤凰池”等句。著名诗人刘禹锡提到“凤池”的诗作也比较多，如《有感》诗中的“昨宵凤池客，今日雀罗门”、《题集贤阁》诗中的“凤池西畔图

书府”，还有《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双鹤》的“何如凤池上”、《奉和裴侍中将赴汉南留别座上诸公》的“金貂晓出凤池头”、《寄唐州杨八归厚》的“一双先入凤池”。

此外，像诗人杜牧、白居易、韩愈、韦应物、武元衡、卢象等均有关于“凤池”的诗句流传后世。

关于凤池，有几种说法。凤池或凤凰池，本是皇帝禁苑中的池沼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之职，分属于尚书省、中书省、门下省，所以三省的长官并称宰相。而中书省因设于禁苑，掌管机要，接近皇帝，其地位比尚书省更为重要，故而有“凤凰池”和“凤池”之称。至唐时，门下省、中书省在禁中左右掖，给事中属门下省，房馆办公

地点就在凤凰池。唐刘知几《史通·史官建置》：“暨皇家之建国也，乃别置史馆，通籍禁门，西京则与鸾渚为邻，东都则与凤池相接。”清孙枝蔚《汪舟次赴赣榆教谕任去后寄怀》诗之二：“凤池与乌臺，旦夕谓可至。”

还有，凤池之称与古琴有关，古琴底有二孔，上孔曰龙池，下孔曰凤池。王谟辑《世本·作篇》：“伏羲氏削桐为琴……龙池八寸通八风，凤池四寸象四时。”再有，凤池也是砚的一种。宋范纂《端溪砚谱》：“砚之形制……曰凤池。”“宣和初，御府降祥造型，若凤字，如凤池样，但平低耳。”看来，凤池一词蕴含丰富，竟然还与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及“文房四宝”之砚有关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